

卡維波，左派裝可愛

林深靖

卡維波自稱是左派，而且是可愛的左派。在《國際邊緣》網站裡，他極力勸勉我們「左派裝可愛」的必要。在〈青春睿智的左派？成年癡呆的左派？——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〉（見《左翼》第16、17號）長文中，他也強調，對於商品消費和通俗文化的挪用，即是要求左派「搞笑可愛性感」，是「考驗左派的創造想像力」、「挑戰左派能不能做到青春睿智（而非成年癡呆）的關鍵」。

「歷史終結」與「告別革命」

卡維波也在文章中展示了幾個「挪用」的範例。譬如，給兒童看凱蒂貓打炮的圖片，就是「挪用Hello Kitty以產生各種反抗與顛覆的意義」。譬如，一個上課打手機聊天、調情的廣告，「有喚起學生抗拒不合理規定的權利意識之潛在可能」。當然，包括青少年「做身體」、嗑藥、援助交際等，卡維波都看到了「抵抗論述」，「幾乎無處不是戰場」。

卡維波還演示了另一個「挪用」的範例。那就是把〈青春睿智卡維波？〉文章標題中的問號悄悄拿掉，「青春睿智」從反諷變成讚頌，然後，堂而皇之地挪用到自己的頭上。由於卡維波在論戰中的拿手招數是頻繁地將「老化」、「弱智」、「癡呆」、「空腦」、「懶惰」、「無能」、「沒有學問」……等詛咒性形容詞拋到對手頭上，因此，在文章

中要證明自己「青春」、「睿智」、「聰明」、「腦滿」、「勤奮」、「能幹」、「飽學」……就成為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任務。當然，對於像卡維波這樣以「機器戰警」做為人類未來理想的好萊塢影迷來說，在「夢工廠」裡，一切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都可以「可愛」名之。

對於卡維波所不屑的「傳統左派」，當然還少不了如預料之中的「化約」、「教條」等一陣亂棒。馬克思在評論法國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的《哲學的貧困》一書時，曾經寫道：「如果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了帽子，那麼，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。」其中，「英國人」是指搞經濟的李嘉圖，「德國人」是指搞哲學的黑格爾。如今，卡維波既不搞經濟也不搞哲學，只不過，他在搞怪搞笑的同時，倒是把觀念變成了棒子。

我在〈青春睿智卡維波？〉一文中已指出，「化約論」或「教條」的指控，既是絆倒左翼的陷阱，也是消解馬克思主義論述的利器。就像指斥對手老化、弱智以凸顯自己「青春睿智」一樣，卡維波似乎也認為，只要拋出「化約、教條」，就足以反證自己的思維是如何的「縝密、靈活」。

很可惜，卡維波的手法常常是粗糙地「化約」對手的觀點，拙劣地將幾個人云亦云的所謂「教條」概括他自己並未曾深入的馬克思理論。關於消費與通俗文化，卡維波主張要「擺脫那些簡化教條的說法，重新看待像減肥美容的媒體風潮、凱蒂貓、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與消費現象」，他遺憾台灣的相關討論，「完全沒有跟上文化研究這一、二十年來的發展」，而「英國文化研究的緣起其實就是對經濟化約論（也就是馬克思的經濟下層決定文化上層）的批判。」

他說，「自從社會主義國家崩解，傳統左派路線不再是一個有效選項而只是一個有效修辭。」卡維波如此急於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效，與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的「歷史終結」論和李澤厚的「告別革

命」說，看不出有什麼差別。而他以經濟決定論來「化約」馬克思的思想，事實上是西方右翼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來的陳腔濫調，關於這一點，博學強記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鄭國棟所寫的〈跳蚤「左派」的滿紙荒唐言——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〉一文（見《左翼》第15號），已有明晰的批判，我不再贅言。

不要讓問號消失！

就像〈青春睿智卡維波？〉的重點是在那個後來被卡維波「化約」掉的「？」號一樣，做為自覺的社會主義者，我對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態度，可以很簡單用一句話概括，那就是：不要讓問號消失！

由於對既定體制的恆常質疑，對異質的、可能的替代方案的追尋，我們面對當前社會中一切障眼法、腹語術，忍不住要去戳穿；當許多人被快樂、希望、春天、花蕊、有夢最美……等甜蜜音符催眠時，我們很不幸被驚醒。我們不可能像卡維波所說的「當所有的人實際上都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內部的今日……還假裝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外部之某個戰略高地」，我們只是有意識地「身」在其中，而不願「陷」在其中。對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「權力」與「錢力」交織的龐巨陰影，我們可能更為敏感，對於消費行為中的商品拜物教以及通俗文化中的偶像崇拜狂熱，我們感受到更深刻的荒謬與荒涼。

當然，在卡維波的認識中，這一切都可能被「挪用反轉」，而形成「零星的反抗」。卡維波基本上還是把對既定威權的挑戰與挑釁視為一種價值，這是左翼進步論述的基礎，但是他又很不屑地把所謂「傳統左派」打為「成年癡呆」，是「青春」的反面，是青少年的對立面。比起文革紅衛兵的「造反有理」，以及法國1968年學運的「禁止說禁止」（Il est interdit d'interdire），卡維波所頌歌的青少年，也許稍顯

蒼白，但是由於擁有打炮的凱蒂貓玩偶和有WAP功能的個性化手機，他們的叛逆形式似乎變得更為豐富多彩。

卡維波以「拼貼」（bricolage）來形容青少年通俗文化，事實上以他所舉的例證，與其說是拼貼，不如說更像是「萬花筒」（kaleidoscope）：隨機聚散、偶然、不沾黏，基本上局限於一定的空間，變化萬端，但絕不出格。

遺產與階級再生產

卡維波採用「年齡政治」的觀點，以二分法區隔「青少年」與「成年人」的世界，前者睿智進步，後者癡呆保守，彷彿世代之間是斷裂的，彼此各成自主、封閉的領域，完全忽略了遺產與階級再生產的關係。事實上，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，世代之間的傳遞繼承，更甚於同世代不同收入者之間的橫向攤派。一個自幼即擁有數千萬長輩贈與的陳家待嫁少女，我們很難期待她參與反高學費的街頭抗爭；同樣的，一個不用當兵的青年醫生駙馬，與陪同失業父母到勞委會門口埋鍋造飯的待役或待業青年，大概也很難期待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立場。無差別地看待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，就像當權者聲稱要同時保障東京貴婦金美齡和慰安婦阿嬤的「言論自由」一樣的虛妄；林肯是這樣做比喻的：狼和羊都同樣追求自由，有人或許因此滿足於兩種動物之間消除了差別，但是，他們沒有注意到：狼要的自由是吃掉羊，羊要的自由是不被吃掉。

卡維波以同樣的二分法區隔「通俗文化」與「高等文化」，他說：「高等文化的創造者是少數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藝術家；通俗文化的創造者就是大眾，人人都是藝術家，這是集體的努力生產的結果。」然後，卡維波又借用文化研究的觀點，將通俗文化與商品消費連繫起來，指出通俗文化是「大眾主動消費商品的結果」，他說，「所有消費

幾乎都是文化實踐：人們在消費中積極主動地創造或維持某種身分認同（個人或集體的）……消費不但是經濟活動，也是交往與對立、形象與認同、夢想與安慰。」

卡維波一方面將消費行為無限上綱，另一方面又將通俗文化移入聖殿，他強調通俗文化的「拼貼」風格即具有反叛的因素，「將符號象徵從其原始脈絡抽離，商品重新被串連，這是個自我定義的活動，從原初意義或生產者的意圖自然形成抵抗，並很容易在被壓迫的情境中產生反對意義。」

卡維波的分類和定義，無疑是導引向「青春就是美的，流行就是好的」這種整體主義的觀點，青少年通俗文化反可能因此走向民粹、媚俗的方向。青春固然是值得讚頌的，但是，對青春和「現此時」（the present）的過度揄揚，卻也可能造成對歷史和「既往」（the past）的輕忽和蔑視。近年來，日本否定侵略戰爭的漫畫書動輒銷售上百萬，右翼勢力在漫畫世代中聲勢浩蕩；美國選出了被認為對歷史極盡無知的鷹派總統小布希；歐洲新法西斯政黨在法、義、比、奧等多個國家崛起……多位學者已指出通俗文化與民粹主義的依存關係。同樣的，流行固然是可慾的，但是過度追求流行也可能產生神聖化收視率、眼球數、銷售量、民調支持度的結果，台灣這幾年來政治和媒體的民粹、媚俗傾向（政治人物、影視明星競相「裝可愛」），與整體通俗文化的氣息和溫度明顯是相互感應的。

蹦極遊戲

大教授卡維波這篇佔了《左翼》30餘頁篇幅的長文，華富炫麗地點綴著文化研究、酷兒理論、後現代的學院名詞，如此彷彿肌體刺青一般醒目耀眼的文字，一方面展現了「青少年通俗文化」逐浪追潮的風采，另一方面，在罵起「那些沒有學問的空腦批判家」時，顯然

更為鏗鏘有力。只不過在這個生活方式選項超市化的現代社會，在這個諸說混同的新時代（New Age），在這個蠻橫、獵奇、高效率的新自由主義與恣肆、享樂、嬉鬧的新自戀主義難分難解的新世紀，他慣性的二分法思維模式，以及奔赴既定事物另一個極端的叛逆典範，不禁讓人想起高空彈跳（中國大陸稱為「蹦極」，是更形象化的用語）的遊戲：一個可愛的左派，在山頂和山谷之間迅猛起落，其間充滿了刺激（刺眼激進）、驚駭（驚世駭俗），但是遊戲者知道身上很安全地綁著堅固的繩索，他很清楚自己終究會回到山頂的「控制台」，擦擦冷汗，卸下繩索，然後，出發尋找下一個玩樂的景點……

——原載於 2001 年 4 月 30 日《左翼》第 18 號